

## 关于儒学当代意义的新思考

——以异于诸时贤之论域的视角立说

○ 蒋国保

(苏州大学 哲学系,江苏 苏州 215123)

**[摘要]**本文对否定儒学有现代意义的观点不以为然,但对肯定儒学有现代意义的八种观点亦不完全赞同。本文认为,儒学之现代(当代)作用的发挥不必通过其思想、学术、理论之内容拓展与形式转化来实现,而必须使其真精神通过世俗化的途径赢得当代民众真诚的情感认同。儒学的世俗化不是使儒学庸俗化,让儒学容易迎合民众的庸俗的要求,而是要让儒学“祛魅”,清除儒学精神贵族化。儒学欲世俗化,必须自我实行立场、观念、导向上的三大转变。

**[关键词]**儒学;现代;当代意义;世俗化

在中国哲学研究上不应该现当代混同,当清楚地区别现代与当代。中国现代哲学要解决的时代主题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现代化,即中国古代哲学在内容上的现代发展与现代架构。而中国当代哲学要解决的时代主题是中国哲学的后现代发展。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现代化在当下仍然是进行时,并非完成时,对于中国哲学的当代推进,实际上并没有超越中国哲学现代化范畴。这也就是说,我辈学人对于中国哲学的当代推进,实际上并不表现为对于中国现代哲学的突破,反倒是表现为沿着中国现代哲人的理路推进中国哲学的当下发展。我们不妨将这种现象解释为“中国当代哲学缺乏当代性”。换言之,中国当代哲学就理论讲本应处理中国哲学的后现代发展问题,但它实际上处理的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发展问题。

### 一、儒学是否有当代意义,取决于当代社会是否更有必要以道德关切为重

我已经记不清是在什么书籍或报刊上看到的一种观点,它以为现代社会因

---

作者简介:蒋国保(1951—),苏州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崇尚实用价值、世俗价值而使得儒学的现代意义(当代意义)无从谈起,儒学真正能起积极影响作用应该是在后现代,因为只有在后现代儒学才能发挥其救治人类因道德价值的消解而必然带来的意义危机、存在危机之现实作用。<sup>[1]</sup> 这种观点的实质在于否认儒学当代意义的现实基础,以为当代社会既然以世俗价值、实用价值为崇尚,就难以接受以道德关切为特性的儒学。这种观点,在我看来,失误有三:首先是对当代社会之价值取向的多元特性缺乏全面把握与深刻认识,殊不知当代社会基于其多元价值观而对各种形色的世俗卑劣价值与神圣高尚价值兼收并蓄,并不简单地排斥任何价值。不排斥任何价值,反过来说,也就意谓可以选择任何价值。其选择的唯一标准,就是实用理性,看它在当下对社会的稳定与健全是不是有正合时宜与事宜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学有无当代意义,不是取决于它是否以道德关切为重,而是取决于当代社会需要不需要以道德关切为重,即关切道德重于关切利益;其次是对世俗价值关切与道德关切的辩证关系缺乏应有的认识,将两者截然对立,以为关切世俗、实用价值,就一定会排斥道德关切,殊不知当代社会固然以世俗价值、实用价值为崇尚,但当代社会正因为这一崇尚而使当代社会更需要道德关切;再次是对儒学精神实质缺乏全面而深刻的认识,以为儒学崇尚道德,提倡道德优先就绝对排斥一切世俗价值,殊不知儒学固然崇尚道德,提倡道德优先,但优先不等于取代、更不是取消,而是强调在诸因素中,道德的因素是第一位的,任何选择在考虑利弊时,首先要考虑道德;在诸种价值中,道德价值是最高的。

这用孟子的话讲,就叫做“何必言利”<sup>[2]</sup>。孟子这样说,并非彻底地否认求利、获利的正当性,言下之意显然在于强调为了求利、获利要首先讲“义”。“见利思义”<sup>[3]</sup>,以义制利,以道德关切规范与包裹利益关切,是儒学义利观的精髓,其精神实质在于强调:对于实现人的本质性的根本利益来说,只能将道德关切放在首位,以道德关切统摄利益关切,而决不能反过来,将利益关切放在首位,以利益关切取消道德关切而使之成为唯一的关切。其中的道理,孟子说得很明白。照孟子所说,如果将利益关切放在首位,人人唯利是求,“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sup>[4]</sup>,人人都希望获得利益更多,由于利益的获得之不平衡是必然的,则人人都希望获得比别人更多的利就必然要造成国家动乱,危害社会的安定。与“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履(满足)”<sup>[5]</sup>相反,如将道德关切放在首位,就能以道德(仁义)保证人人求利、获利的正当性、合理性,因为“未有仁而遗其亲者,未有义而后其君者”<sup>[6]</sup>,一个以道德关切为首位(这意味着对道德的崇尚胜过对利益的崇尚)的人,决不会在利益面前只为自己着想而不顾他人利益。全社会每个人都能不以损害他人的利益作为自己获利的基本手段,全社会的安定就有了根本的保证。反之,社会必因人以不正当的手段争利而动乱。社会一动乱,从道理上讲全社会的每个人都失去了得利的可能,而一律遭受社会动乱所造成的痛苦。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儒家强调,即便为了获利,人在抉择上,也应“义”字在先,而不能“利”字当先。当代社会最大的弊病,就是在价值取向上“利”字当先,

人们多以争得更多的私利为成就、为目的,甚至为理想。将“争利”合法化、甚至神圣化之后,道德就彻底地失去了约束力,当代社会也就只能靠强有力的法治手段来维持社会的基本稳定。由当代社会越来越强化法治手段这一事实就可以推断当代社会越发缺乏甚至失去道德约束,而当代社会道德约束的缺失则足以证明儒学的道德优先学说,对于救治当代社会之利益当先之弊病,能起到对症下药的明显现实作用。因此,儒学在当代,不是无从发挥积极作用,而是可以发挥稳定社会的根本作用。

## 二、儒学的现代(当代)意义:“机运”论域之诸种论说

另有一种观点,与上述否定儒学有可能发挥现代(当代)意义的观点正相反,它认为儒学所以能在现代(当代)发挥积极作用,正因为它恰逢其时,机运到来。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梁漱溟就在其出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梁漱溟看来,“世界未来文化”就是指“中国文化复兴”;而“中国文化复兴”,仅仅意味着“走孔子的路”<sup>[7]</sup>。当他把“中国文化复兴”确定为“走孔子的路”时,他便认定儒学对现代中国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未来都具有不可取代的指导价值。因此,他所要作的进一步论证,就不是为了提示“中国文化复兴”为何要“走孔子的路”,而只是为了揭示“世界未来文化”为何必然要“走孔子的路”。根据《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的论述,我们得以清楚地了解:梁漱溟断言“世界未来文化”必然要“走孔子的路”,是基于他对中西印三大文化系统的比较。他认为文化是“民族生活的样法”<sup>[8]</sup>,而“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sup>[9]</sup>。根据这个文化定义,他在进行中西印文化比较时,竭力证明中西印三大文化分别体现了人类生存“意欲”之发用的不同路向。人类生存“意欲”的发用,在他看来,只能走“三个不同的路向”:(一)向前面要求;(二)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三)转身向后去要求<sup>[10]</sup>,因而他也就很方便地把中西印三大文化的差异归结为这三种生活态度的差异:西方文化体现了“第一条路向”,“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sup>[11]</sup>;中国文化体现了“第二条路向”,“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sup>[12]</sup>;印度文化体现了“第三条路向”,“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sup>[13]</sup>。这种差异,虽不足以表明中西印三大文化之间存在着所谓优劣高低,但作为不同生活态度的体现,它们对于人类生活的“合宜不合宜”,又确实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中西印三大文化不可能在同一时代里同时都合宜。这显然是就人类文化发展的常规而言的。因为由“第一路向”经“第二路向”走向“第三路向”,是任何民族的文化发展都不可违背的文化发展常规,所以,像中国人那样,不待第一路走完,“便中途拐弯到第二路上来”<sup>[14]</sup>,属于文化上的早熟,是不合时宜的;像印度人那样,“不待第一路第二路走完而径直拐到第三路上去”<sup>[15]</sup>,也属于文化上的早熟,也不合时宜。

但是,对于解决近代人的生活问题不合时宜的中印文化,随着时代的变化。总会有“机运到来”<sup>[16]</sup>之时。而根据人类文化发展的常规,印度文化之合时宜,

或者说印度文化之复兴,只能出现在中国文化复兴(意味着中国文化之合时宜)之后,所以,当人类想抛弃西方人所走的“第一路向”(因为此路向已走到极端,已弄得人类社会“病痛百出”)而转向“第二路向”发展人类文化时,以前“不合时宜的中国态度遂达其真必要之会”<sup>[17]</sup>。中国人生活态度之合时宜,决定了世界未来文化发展必然要走中国所走的“第二路向”。而走“第二路向”,也就是走“孔子的路”,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态度即孔子所认定的态度。但梁漱溟在如此论证世界未来文化为何必然要“走孔子的路”的同时,又强调指出,所谓“走孔子的路”,决不是指“孔家”思想的简单“复古”,而是指“孔家”思想在现代历史背景下的“复兴”。问题是,通过什么途径才能复兴?这个问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这样提的:“我们中国人现在应持的态度是怎样才对呢?对于这三态度何取何舍呢?”他的回答是:“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第三,批评地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sup>[18]</sup>,这三条,可以视为他关于如何实现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如何实现中国文化复兴的具体原则。

在梁漱溟之后,就“机运”角度(亦可谓时代背景视角)论证儒学的意义与作用的研究可谓层出不穷,花样翻新,但概而言之,不妨归纳为以下诸说:(1)拯救说。此说基于对现代(当代)社会的人之道德失范、意义失落、理想迷失之存在危机的批判性的审视,强调儒学之所以能在现代(当代)社会发挥巨大的现实作用,就在于它具有拯救现代(当代)社会严重的存在危机的意义与价值,可以为救治现代(当代)社会弊病发挥积极作用;(2)适应说。此说依据古代价值与现代价值在精神上可以沟通之理论,以为儒学的现代(当代)价值,正体现在它在精神上与现代(当代)人的价值期盼与追求相吻合,从而能适应现代(当代)人所推动和推进的现代化事业;(3)开新说。此说不以“适应说”为然,以为如“适应说”似的谈儒学对中国现代化的促进作用,谈的是“凑合”作用,然而儒学对于现代化能起积极作用,并不表现为它在精神上能凑合上现代精神,而在于它可以内在地(出于自身的内在要求)开出现代精神,即民主与科学,且这一儒学自身的开新,正是儒学生命力应有的拓展;(4)生活说。此说又分两种讲法,一种讲法主张以儒家的生活理念(形而下学)来构想当代人“当下的生存、当下的生活、当下的情感”<sup>[19]</sup>,以为儒学的现代意义与价值,并非体现在对现代(当代)社会弊病的救治上,而是体现在改变当代人的生活上;另一种讲法则强调儒学在失去了制度护卫的背景下,要在现代(当代)社会发挥作用,只能通过如下途径:直接面对民众的生活以指导民众生活。这两种讲法相通点在于都以为儒学现代意义就体现在它可以对现代(当代)人的生活积极干预;(5)终极关切说。此说又分为两支,一支不妨称为“立教”说(确立“儒学为宗教”说),另一支不妨称为“立性”说(确立“儒学有宗教性”说)。“立教”说强调儒学在现代(当代)社会仍能发挥现实积极作用,因为儒学不是一般的学术,儒学就是宗教,具备了与基督教等世界其它宗教相同或相似的特性与特征;“立性”说则强调儒学非严格意义上的宗

教,但它以道德代宗教,有宗教性,在现代(当代)社会也能起到与宗教同样的作用。这两支说法相异,但立论的主旨却惊人的相似,即都旨在强调:儒学所以具有现代意义与价值,就因为儒学有宗教一样的终极关切,能为现代(当代)人安身立命营造精神家园、提供最高的精神支柱;(6)对对话说。此说坚持多元价值观,以为儒学的现代(当代)意义与价值,并非如某些学者所强调的,意味着世界未来文化建设与发展在价值取向上统统以儒家价值理想为宗统,意味着儒学代表未来世界文化走向、全世界未来在文化上必以儒学为旨归、为理想,它只能体现在:通过与世界各优秀文化的积极对话而实现其作为世界未来新文化构建所不可或缺的一种思想资源的价值。

以上关于儒学可以在现代(当代)社会发挥积极作用的种种论说,就其各自的立论来说,未必不能自圆其说,然而又都不同程度地忽视了一个本不应忽视的问题,即在现代(当代)民众疏离儒学的背景下,如何以切实可行的办法以争取民众对儒学的情感认同。而这个问题,正是本文作者侧重研究的问题。

### 三、以世俗化——祛精神贵族化——实现儒学的当代意义

近十年来,我坚持研究儒学的现代命运与当代发展这一课题。在此课题的研究过程中,我对儒学当代意义这个问题逐渐形成了独自的认识。我的这方面的认识,首先在于对各种否定儒学有现代(当代)意义的观点持反对态度,坚信儒学能发挥现代(当代)作用是不争的事实;其次在于对上述种种肯定儒学有现代(当代)意义的观点都难以彻底信服,以为儒学之现代(当代)作用的发挥不必通过其思想、学术、理论之内容拓展与形式转化来实现,而必须使其真精神通过世俗化的途径赢得当代民众真诚的情感认同。由于篇幅限制只简单谈谈有关认识要点。

其一,怎样看待儒学的现代(当代)意义?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两种不同讲法,一种是将它讲成了如同陈列在博物馆中的精美文物,具有供人欣赏的价值;另一种将它讲成了如同刚健活泼的巨人,以其生机勃勃的生命力而具有创造新文化的不朽价值。前一种讲法,实是藉比喻以说明儒学精神已死,已不具备作为创造新文化之精神生命的价值。与之相比,后一种讲法,正在于强调:儒学不是死的文化学术之陈迹符号,儒学作为中华民族生命精神之传承,就活在当下,活在全世界每一个华人的心中,甚至活在每一个认同汉文化价值的海外人士的心中。值得我们去认真讨论的应是后一种观点。对于这样的观点,我认为不必武断地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意见,当先审视其所谓“活”是从什么意义上强调的。如果它是从只要是华人就天然地认同儒学这个意义上强调的,那么就有必要质疑之,因为“华人天然认同儒学”之观点的思想基础在于认定只要是华人就必定在文化血脉上流淌着儒家的精神生命鲜血,殊不知在全球化背景下,价值多元化是必然的取向,华人即便比其他种族更具有寻根意识,也不可能做到唯儒学是取,在文化遗产的精神血脉上只流淌着儒家的精神生命鲜血。而在事实上,正如

杜维明早年所揭示的,不用说外国人,连华人对儒学都有疏离感,甚至有不少华人对儒学还有“先天的拒斥感”。

如果它是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道理上强调的,那么说儒学有现代(当代)意义就难以质疑,可以成立,因为古今社会尽管千差万别,根本不同,但组成社会者毕竟是人;既同为人,则古今不同社会的人就有可能在心灵上相通。古今不同社会的人在心灵上既可以相通,则为古代人所接受的儒学,自然也会为当代人所接受。儒学所以如此具有跨时代价值,在古今社会都能发挥积极的作用,是因为儒学就是人学,其基本精神、基本理论乃关乎做人的基本道理。

儒学固然主张“三达德”,强调做健全的人当“智仁勇”全面发展,不可偏废。但儒学所阐述的做人道理若概而言之的话,不外乎要人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既然儒学以为其本质就在于高度重视道德价值,强调做人首先要重道德,力求一言一行不违背做人的良心,则儒学要在当代社会发挥积极的作用,不但取决于它所阐述的做人之基本道理对于当代民众之做人是否不可或缺,更取决于当代民众对于高度重视道德价值、以道德立命是否有迫切的需求。从民众对当前广泛而严重的道德失范现象的反应——普遍不满、强烈义愤——来看,当代社会已走到了迫切需要崇尚道德价值的时代。当一个时代迫切需要崇尚道德价值的话,就意味着儒学大显身手、积极发挥作用的机运到来。这从近二十年来在我国兴起了“国学热”(姑且不论是否虚热),就不难看出。近一两年,我国在大力反腐败的同时,又积极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在我看来,是将西方优秀文化所倡导的价值(自由、民主、平等、法治)与儒学所崇尚的价值相融合的产物,<sup>[20]</sup>它的产生,足以证明儒学能以积极的方式对当代我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产生积极的引导作用。

其二,怎样认识儒学实现其当代意义的途径?这个问题的提出,出于以下考虑:儒学是否具有当代意义与儒学是否能实现其当代意义,是有区别的两个问题。就如同榴莲固然是美味,有些人爱吃,有些人不爱吃一样的道理,现代民众如果即便觉得儒学有现实价值也不乐意接受它,不情愿以它规范自己的言行,则儒学仍不能发挥其积极作用,实现其当代意义,因为儒学当代意义的实现毕竟体现在广大民众自觉实践儒学上,而非仅仅体现在少数士人对儒学之现实价值的知识理性层面的认知上。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在对否定儒学有当代意义与价值的观点表示反对的同时,我又对种种肯定儒学有当代意义与价值的观点(见上面具体论述)表示不能完全认同、不能彻底赞成。之所以对上述那些观点都难以彻底赞成,是因为我认为那些观点尽管各有启迪,但由于它们都着眼于儒学是否有现代(当代)意义就看儒学能否适应现代(当代)社会的需要,以为儒学只要适应当代社会的需要,就一定能发挥其当代作用,而对儒学如何赢得当代民众的情感认同从而真正为当代社会所需这一问题缺乏应有的思考,所以它们存在着共通的迷失,即对如何以切实可行的途径赢得当代民众对儒学的情感认同缺乏

起码的认识,因而它们范畴下的儒学现代(当代)意义实现之途径(诸如钱穆的“反本开新”说、牟宗三的“内圣开出新外王”说)的设计,实际上脱离了广大民众的现实需要,变成了一纸空谈,于儒学当代意义的实现不能真正起到导向作用。

要避免这一迷失,在我看来,不但要认识到设计一个有助于赢得民众情感认同的切实可行的途径对实现儒学的当代意义来说至关重要,更要认真思考什么途径才是儒学真正能赢得当代民众情感认同的途径。儒学与现代(当代)民众情感上发生疏离问题,根由不在民众,而在儒学,是因为儒学失去赢得当代民众情感认同之优势所致。这用不着深说,仅仅从基督教、佛教在我国农村已广泛地主宰了底层民众的心灵这一事实就不难推断儒学即便在它的故乡也失去了维系民众情感世界的优势。这令人不得不认真思考一个问题,即原本以讲做人道理见长的儒学为何会在现代(当代)社会丧失了把握人之情感的优势。有学者将这解释为当代民众在情感认同上过度实用考量所致。这个解释有一定的道理,但未必切中问题的要害,否则,以下现象如何解释:同样在情感认同上偏重于实用考量的底层民众,为何相比于儒学而更乐意认同基督教、佛教说教。一方面冷漠儒学,另一方面热衷于基督教、佛教,两相对比,就不难推想:当代底层民众对儒学缺乏认同情感,一定是因为儒学自身的问题所致,因为若问题出在民众方面,则民众决不会仅冷漠儒学,也应当一并冷漠基督教与佛教。

现在的问题是:儒学造成其与民众情感疏离的自身的问题是什么?在我看来,这就是儒学因没有经历像基督教、佛教那样的世俗化过程而保存着相当严重的精神贵族化的思想倾向。所谓精神贵族化,不但是指过度地推崇精神价值而轻视乃至贬低物质价值,更是指对世俗崇尚的彻底否定,对世俗情感、世俗愿望、世俗追求、世俗理想一律以负面价值谴责之、批判之,否定之,以为唯有精神生活才是高贵的生活、唯有过高贵生活的人才是高贵的人(圣贤)。儒学既然存在精神贵族化的思想倾向,其与为世俗生活而忙碌的底层民众在情感上难以产生共鸣也就是不言而喻的。儒学要发挥当代作用,实现当代意义,当前迫切要做的事,就是要通过儒学世俗化的过程以消解儒学之精神贵族化思想倾向,使儒学透过汉唐的“工具儒学”、宋明的“形上儒学”、现代的“架构儒学”而直接回归先秦的“原始儒学”。儒学世俗化是漫长的过程,自然有许多艰巨的理论与实际工作要做,但有两点,需首先弄明白:

(一)儒学是否有世俗化问题。对这个问题,要历史地看:儒学世俗化问题并非儒学始终存在的问题,它是儒学在发展过程中造成的问题。就原始儒学讲,儒学本无世俗化问题,因为孔子创立儒学,走的是生活儒学的路子,以人文的、世俗的情怀,直接面对现世社会以回答人之现实的世俗困惑、世俗问题、世俗要求、世俗情感与愿望。但在孔子之后,他的后学,无论是汉唐儒家还是宋明儒家,总是在想以不同于他之创立儒学的路数来发展他所创立的儒学。这样的发展儒学,本质上讲是以儒学“凑合”时代的需要,固然造成了儒学的与时俱进,也必然引起儒学的危机。而造成儒学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先秦以后的儒学的发展,一

方面越来越消解儒学的世俗性,另一方面越来越走向精神贵族化。

就儒学发展史来看,为化解危机、求自身的长足发展,儒学迄今已兴起三次大复兴运动,但每一次儒学复兴运动都以消解儒学的世俗性为旨归,拉开了儒学与民众亲近的距离。儒学的第一次复兴在汉代。这次儒学复兴运动,消解了黄老之学对儒学的威胁,确立了儒学作为封建大一统帝国的官方哲学的地位,但由于力求护卫官方哲学的地位以及显示官方哲学的特色,这次儒学复兴运动最终的结果是化“学”为“术”,将原始儒家的世俗儒学变为汉唐儒家的工具儒学(制度儒学),或曰将原始儒家的“修己安人”之学(人学)化为汉唐儒家的章句之学(经学)。儒学第二次复兴在宋代。这次儒学复兴运动,既消解了佛道二教对儒学的威胁,亦消解了唐末五代的道德沦丧所造成的文化意义危机,重新确立了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正统地位,但由于过度地“尊德性”,重在彰显儒学实践理性的价值,这次儒学复兴运动最终的结果是将汉唐儒家的工具儒学化为宋元明清儒家的形上儒学,在回归孔孟的旗下背离了原始儒学之形而下世界的人文精神追求与价值取向。儒学第三次复兴在二十世纪初,迄今尚未最终完成。这次儒学复兴运动,已一定程度地消解了西学对儒学的威胁,某种程度地确立了儒学的普世价值,但由于过度地诠释儒学所具有的知识理性(道问学)与现代价值,这次儒学复兴运动已产生的结果是化宋元明清儒家的形上儒学为现代新儒家的架构儒学,造成了儒学与民众的新的疏离。

回顾儒学三次复兴的历史,总结其历史经验,对当下谋求儒学的健康发展能有怎样的启示呢?这个启示就是,当下要复兴儒学,发挥儒学的当代意义,实现儒学现代化,当避免走儒学精神贵族化的路子,消除制度儒学、形上儒学、架构儒学的影响,直接“返本”,回归原始儒学,以原始儒学的世俗精神薪向争取民心,赢得当代民众的情感认同。正是基于这个认识,我对当前国内种种复兴儒学的主张,都保留意见。我既主张当下发展儒学当“接着原始儒学讲”,走生活的路子以争取民众对儒学的认同,自然就不赞同“政治儒学”、“宗教儒学”的主张,即不主张以把儒学变成意识形态、变成仪式化的宗教的方式求得儒学的所谓发展;可为什么又不完全赞同“生活儒学”的主张?这是因为:我所说的走生活的路子以发展儒学,是从反对循宗教的、哲学之超越的路数发展儒学的意义上强调的,与其他学者之“生活儒学”的主张在论旨与论证上不尽相同。国内其他学者讲“生活儒学”,不外乎两种讲法,一种讲法是讲儒学如果是一种哲学的话,那么它只能是“生活哲学”,是走“生活的路数”所建构起来的哲学;另一种讲法是讲儒学在失去了制度护卫的背景下,要得以生存与发展,只能直接面对民众的生活以发挥其指导民众生活的作用。这两种讲法,对于我们认识儒学的性质,正确地推动儒学当代复兴,是十分有益的启迪,但这两种讲法都是设想儒学只要发挥作用,真正影响民众(无论是影响其心灵还是影响其生活),儒学就得以复兴,并没有进一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民众疏离、冷漠乃至拒斥儒学——这意味着儒学即便有收拾人心的作用,也未必真能收拾民心——的背景下,儒学如何有可能发



挥其安抚民心、指导民众生活的现实作用。也许有学者要说,这是个杞人忧天似的问题,殊不知儒学是中华文化的命脉,只要是华人就没有理由拒绝儒学,就自然会基于其生命的需要认同儒学。这充其量只是个机智的辩解,无益于该问题的解答,因为我们很容易反驳说:既然华人基于其中国文化的情怀自然会认同儒学,那么儒学何以一而再、再而三地民众所疏离,发生存在危机。由此看来,儒学要在当下发挥其收拾民心的作用,消解其存在危机,决不能迷失于幻想或空想,当另寻现实可靠的途径。这个途径,在我看来,就是通过儒学世俗化以实现儒学的大众化、普世化,使儒学的普世价值得以发挥作用。世俗化是手段,大众化是途径,普世化是目的。没有儒学的世俗化,儒学的大众化就无从谈起,而没有儒学的大众化,儒学的普世化就无从实现,因为如没有儒学的大众化,儒学的影响就只能局限于特定的阶层,比方说知识分子阶层,却难以影响广大的民众,儒学的普世价值因而就不能体现;而儒学的普世价值如不能体现,则儒学世俗化就无必要。由此可见,儒学的世俗化,是当下复兴儒学当首先考虑的问题。

(二)儒学如何实现世俗化,即通过什么途径实现儒学世俗化?对这个问题,我已多次阐述,<sup>[21]</sup>概要归纳一下的话,大意是说:儒学的世俗化不是使儒学庸俗化,让儒学容易迎合民众的庸俗的要求,而是要让儒学“祛魅”,清除儒学精神贵族化——以儒学为“生民立命”、以儒学救人类——的倾向,将儒学化为民众世俗生活的精神导向。为了实现儒学的世俗化,儒学的当下发展,迫切需要三大转变:(1)改变立场,由重“士”转向重“民”;(2)改变观念,由不能容忍世俗价值转向重视民众的世俗愿望与世俗要求;(3)改变导向,由专注正面指导人生转向积极关注人生的负面问题。

### 注释:

[1]承蒙北大李翔海教授告知,韩国黄秉泰先生在其《儒学与现代性——中日韩儒学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一书中可能谈过此观点。经查,黄先生在该著中的确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即“儒家宛如‘潘多拉的魔盒’,在现代化正在进行时必须牢牢封住,只有在现代化已经成为民族机体内的‘现代性’之后,才能小心翼翼地把它打开”。这的确是儒学唯有在后现代才能起作用这一观点的形象说法。但黄先生主要是从“儒家文化变异冲动的衰减”来谈儒学对东亚迈向现代化的阻碍,与本文这里所提及的论点有明显的不同。

[2][4][5][6]《孟子·梁惠王上》。

[3]《论语·宪问》。

[7][8][9][10][11][12][13][14][15][16][17][18]《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98、352、352、382、383、383、383、526、526、526、526、528页。

[19]郭沂编:《开新——当代儒学理论创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67页。

[20]有学者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在表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二十四个字中,有十六个字出自儒家经典,只有八个字——自由、民主、平等、法治——是对西方价值观的称谓。这对我的观点是十分有力的佐证。

[21]多收于拙著:《儒学纵横论》,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最近的阐述为《儒学三次复兴的当代启示》,《孔子研究》2013年第3期,有兴趣者请参阅。

[责任编辑:嘉 耀]